

符号学如何将传统恢复为哲学 (《符号学对哲学的冲击》第四章)

约翰·迪利著，周劲松译

是的，我们已经看到符号学在用属于其自身的标准取代关于观念方式的认识论标准方面，同现代性之间有着决定性断裂（还须说明的是，这标准与纯粹的认识论标准相去甚远¹），它描绘出并构成了一道后现代路径，一个新的开端，由此方式中所表现出的激进之处，犹如现代哲学之与十七世纪拉丁时期的断裂，又如更早时候，拉丁时期与古希腊思想在公元五世纪，符号作为普遍存在模式这一概念得以引入之前的断裂，根据这一概念，自然符号和规约符号都同样地是属类性质的，是特定的类型或变体。

但是，为了让我们能从理解哲学的目的出发来欣赏这种断裂的充分蕴涵，我们须考虑到二十世纪符号学研究所揭示的这个仅此便足以令人惊讶的事实，也就是翁贝托·埃柯（Umberto Eco）及其博洛尼亚大学的知识考古学家小组²所发掘出来的事实，即，在奥古斯丁公元四世纪末的工作之前，我们在希腊哲学中没有发现有关符号总体概念的任何痕迹。这个事实难以置信。我记得，在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说的时侯无比惊讶，³这些年来的努力，让我认识到，这种反常必定对于我们阅读在其历史发展中作为整体的哲学带来冲击。埃柯和他的同事宣称要表明，尽管我们为了追溯主要概念的希腊渊源而对哲学充满兴趣，就符号而言，这个比自然与文化的分野更为优先的关于普遍存在模式的关键概念，根本不属于希腊人，而属于希波的奥古斯丁这个不懂希腊文的人。在奥古斯丁之后，会有自然符号和文化符号；但是在奥古斯丁之前，希腊人主要地、几乎排他性地用自然来思考符号。希腊文中的 *σημειον* 一词根本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总体性符号”

¹ 参本书第六章中之“双重认识下的符号学”一节。可进一步参看《四个时期》第261页之注释28。

² 参 Deely, Williams, and Kruse 1986: xix 关于埃柯，伦博蒂尼（Lambertini），马尔莫（Marmo）以及塔巴诺尼（Tabarroni）等人的“描述性注释”（descriptive note）。

³ 那是在1983年的时候，当时埃柯和我一同在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学院的暑期学校执教。很久之后，在研究《四个时期》过程中，我注意到即使马库斯（Markus, 1972:66）这位独立于埃柯及其小组奠定了这里所讨论的这个事实的人，也难以相信在奥古斯丁之前竟然没有人把语言作为一种符号体系来思考。

(sign in general), 而是“专指性的自然符号”(natural sign in particular)。总体性符号这个概念, 确切地说, *signum* 这个词, 是奥古斯丁在四世纪末提出的拉丁文术语, 他以之表示人类经验世界渗透着符号这个观念, 不仅在医药、健康和天气等符号中通过我们与物质性环境的自然存在之间的接触渗透, 而且在话语和贸易中通过我们与同类的接触渗透, 甚至渗透在在我们与神灵通过圣礼和雕刻的接触之中。

我们已经回不去了。拉丁时期诞生在关于符号作为无处不在的理解工具这种观念中。这个事实的后果则要用十二个世纪的时间, 才能在伽利略和笛卡尔的当代人约翰·普安索的《论符号》(*Treatise on Signs*) 中找到其思辨性的根基, 而确切地说, 普安索绝对是属于拉丁过往, 正如伽利略和笛卡尔之(分别)属于现代这一未来阶段的杰克博士和海德先生。奥托·伯德(Otto Bird)第一个指出,¹根据从奥古斯丁到普安索的发展来看, 无疑会导致作为哲学史上一个时期的“关于中世纪的一个新的决定”。²但是, 为了欣赏拉丁符号学发展的缓慢进程, 我认为, 我们须提醒自己, 人类首先是动物, 而动物之经验自然世界, 首先不是将其作为事物, 而是作为有待寻求、回避或忽略的客体。动物使用符号而并不知道符号存在, 更不必说它们没有意识到, 符号在经验的客观世界之中是一种普遍性工具, 普遍得如同物质存在着世界中的运动一般。³

在符号渗透到客体世界的过程中, 拉丁人觉得, 甚至到奥古斯丁提出自己的总体性方案为止, 符号都并不是作为一种三元关系的纯粹而专门的存在(同所有关系一样, 对于使之在物质性方面和客观性方面显得真实或者仅仅在客观性方面显得真实的周围环境, 是无动于衷的); 同时, 同所有关系一样, 对于感觉认识藉之仅仅看到了相关事物的那双眼睛而言是不可见的, 更应该说, 在其作为经验过的客体之间的关联关系这种可感觉到的展现中, 也是不可见的, 通过这种关联关系, 某一客体在被感觉认识的过程中, 在自身之外也展现了另外一个客体, 或许, 甚至这另外的一个是直接的感觉认识环境中所没有的, 只是一个被记住、被期盼或被想象的客体。为了被经验, 该客体预设了符号已经在理解活动中起作用

¹ 见他于 1997 年 8 月 27 日为多伦多大学写的一份评估报告草稿。

² 伯德这一表达, 被我在为 Doyle 2001 这本书所写的前言中用作标题。

³ 到目前为止, 当代作家中对这一论点最有趣的梳理, 见于 Jaques Maritain 1937-1938:1; 1938:299; 1956:59; 1957:86。综合性的讨论可参 Deely 1986a。

这一前提，这是拉丁人所从未想到过的，尽管对于这种认识而言——专属符号的存在根本不是可感的某种东西的存在，而是不可化约为任何主观性方面的关系的存在，这些方面只是为了在这些或那些具体条件下存在而（作为“再现体”）偶然地依赖这种关系——结果是非常显明的。¹

拉丁人的特权在于是他们首先提出了并随后澄清了关于符号的总体性概念。在这之后现代性登场，这是朝向理解客体的一种新的方式，不过仍未达到关于客体预设了符号这种进一步的认识，实际上，这种方式最初的发展与这种认识所包含的内容是相反的。²就这种面向客体的新方法导致把实验性知识在主题和建制上确立为在此之前只在共识性知识方面得到确立的人类理解的的崭新事业而言，现代性可谓成功。³然而，迄今为止现代性误将新科学当作仅仅是换了一种方式的旧的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原来如此”），现代性引入了对史诗性成分的误解，去除这种误解的任务便主要地落在了符号学肩上。⁴最终，后现代性的曙光到来，符号（*signum*）在查尔斯·桑德斯·“圣地亚哥”·皮尔斯这位值得与亚里斯多德和阿奎那并称的第一位美国哲学家的著作中复兴。的确，皮尔斯跻身最后的现代人之列；但是，更重要的，他是后现代人中之第一人，因为笛卡尔之后（黑格尔是部分例外），他第一个揭示并专题论述在客体世界范畴中，包含了某种自身也具有自然的物质性存在的东西——第二性（*Secondness*），它无比接近却又漫不经心地游弋于人类信念与观察体系之外。

拉丁人发现了符号专有的存在并将其视为我们关于客体经验的基础。但是行动因存在而来。亟待进行的下一步将会是对符号行为进行专题论述，这么做的确切目的是为了详尽地理解这种符号专有的存在需要什么。这正是皮尔斯在关于拉

¹ 所谓穷尽所有结果方式之后非常显明，即是说：一旦这一点得到了进一步的认知。

² 关于对此的细节表述，参见 Deely 1994a，另可参 Santaella-Braga 1994 中所做评价。

³ 理解伽利略受审的重要方式，是看到在这件事中哲学家和神学家非法地延展了实验结论，以之宣布解决了关于依靠观念方式被带到人类理解轨道中的那些事件的诸多问题。对此，斯迪尔曼·德内克（Stillman Drake, 1983: 158）正确地注意到“哲学家们在他们未曾有过研究的领域中过于自信……这才是伽利略所真正反对的东西。”

⁴ 连同皮尔斯对边沁实验性知识和共识性知识这一区分的挪用一道（参见本书第二章中之注释），中世纪拉丁人关于科学与教义之间的区分（*scientia / doctrina* distinction，参见 Deely 1976, 1977, 1978, 1982a, 1986b, 2001: Chap. 11）亦汇入符号学后现代语境（Sebeok 1976: x），它标志着朝向所亟待的革新的良好开端。参见本章之相关注释。

拉丁人对在其专有存在中的符号所做出的发现有了大量的（尽管不是全部的）最初了解之后所做的事情。他甚至给这个行动取了个名字，“符号活动”（*semiosis*），以此作为主题，对其的研究则成了一种特别的哲学知识，甚至科学知识，即“符号学”（*semiotics*），正如生物学是针对生命事物的研究发展出来的知识体系，地理学时从对地球的研究发展出来的知识体系。拉丁人还向我们展现出，在每个符号中都涉及到的三个术语是必要的，但是他们生机勃勃的传统在还没有人想起要给第三个术语命名之前就结束了。这个任务也落在皮尔斯肩上，他称之为“解释项”（*interpretant*），并进一步发现（可惜未曾成功地做出解释¹），解释项不必涉及有限的意识。

洛克仅仅是提出了符号学，这种提法和他本人的《人类理解论》有所冲突，²当然，他的提议是向现代思想的开端靠近了一步；但它对于现代发展却没有产生影响。它也没有体现过往的拉丁人在这件事上的任何意识，或许仅仅勉强有“符号学说”（*doctrina signorum*）这个拉丁文表达的回响（洛克用“符号学说”[*doctrine of signs*]这个英语表达来翻译他错误构造的新希腊语术语 *δημιωικη*），实际上，*doctrina signorum* 是普安索在解释自己《论符号》的内容和计划时所用到的表达。如果这个提议在其所处的时代产生了影响，我们现在或许不必谈起后现代性，因为哲学主流的现代发展（与科学大相径庭地³）将会从此被摒弃，或者，它本身会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作为符号学出现的那种东西。但是，这个提议并未产生影响；海德先生还要活上许多年，并成长为唯心论的怪物，无论头脑在其所知道的

¹ 参见“宏阔的视野”（*The Grand Vision*）（Deely 1989）。这是我们在本书第一章的开篇讨论过的问题，关于符号活动能够深入事物的存在多远这个“开放性问题”。

² 这里我只能略略提到，洛克杜撰了被证明在其后现代的道成肉身中对于符号学“具有逻辑正确性的名称”。但是，我曾多次从多个角度对其展开讨论（参见：Deely 1985a, 1986, 1993, 1995a, 2001a 以及《四个时期》的第十四章）。

³ 我们的书分别轻描淡写（Sebeok 2001:8，但请注意第 185 页上的注释 5）和着重强调（Deely 2001）为了符号学而引入的作为学说（*doctrina*）的哲学和作为科学（*scientia*）的现代科学之间的区别，这好比夜行的轮船，不着痕迹地滑过水面（那么地不引人注意）；但是，既然针对这种区别就是涉及历经现代阶段之前、其间和其后的整个发展的哲学史的核心论题做出完全肯定，（在整个历史时期）仅仅在《四个时期》（Deely 2001）中找得到，我有理由相信，西比奥克对这一论点的兴趣在有生之年定会得到更新。在这种关联中最有有用的，正如我在此所试图表示的那样，在于皮尔斯对边沁术语的移用——边沁对来自工具为基础的实验的知识，或称“实验性知识”（*ideoscopic knowledge*），以及分析性地以寻常经验作为基础的知识，或称“常识性知识”（*cenoscopic knowledge*）——对此，本书第二章和本章的相关注释中业已提及，同时，关于这一点，在为《四个时期》写索引的过程中我也有挥之不去的深刻体会。

东西中知道的是什麼，反正是由头脑本身所创造出来的学说，对于这样一种学说，现代后期哲学家雅克·马里丹在满腔怒火中最后提出，¹应该拒绝赋予其哲学之名，赞成以“伪装成哲学的唯心论”（ideosophy）这个名字取而代之。²

早在洛克 1690 年提出符号学的时候，拉丁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对于作为普遍存在模式的符号特有存在首先提出（奥古斯丁在公元 397 年）并做出最终解释（普安索在 1632 年）——就已经跨过社会界线，把当代关注和文化无意识一分两散，前面好多代人类动物所取得的成就被遗忘，淡出了活着的这一代人类动物的意识关注焦点。所以，让我竭力来揭示吧，在重新聚焦符号之上的过程中，后现代思想的宿命的一部分，就是通过符号主题，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让整个拉丁时期回复统一，这一主题，我们将看到，重复了从奥古斯丁到奥克汉姆（Ockham）为止的中世纪哲学的“标准呈现”中所包含的所有熟悉话题，但是，这一主题是将它们作为符号主题的附属主题进行重复，于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把这个时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一起来。这种方法超过了“标准覆盖面”，因为它要求我们考虑奥克汉姆之后的一系列思想家，这些人提供了与普安索那本总结拉丁发展的符号线索的《符号论》之间的各种关联，而不仅仅是从奥古斯丁开始到奥克汉姆之前的一系列思想家。³

¹ 尤可参见 Maritain 1968: 102。

² 但是，除开彼得·雷德帕斯（Peter Redpath, 1997, 1997a, 1998）围绕此论点的那些惊人著述之外，马里丹的提议根本不为人所动，我为此所给出的理由，见《四个时期》的结尾段，第 511——512 页注释 1。

³ 普安索的生卒年代为 1589——1644，奥克汉姆的生卒年代为 1288——1348，——译者注

译文出自：

John Deely, *The Impact on Philosophy of Semiotics: The Quasi-Error of the External World with a Dialogue between a 'Semiotist' and a 'Realist'*, South Bend, Indiana: St. Augustine's Press, 2003, pp. 51-89.